

杨朝明 © 主编

论语 诠解

中华
经典
诠解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

杨朝明◎主编

论语 诠解

中华
经典
诠解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Shandong Friendship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诠解 / 杨朝明主编. - 济南 : 山东友谊出版社, 2012.9(2014.05 重印)
(中华经典诠解 ; 2)

ISBN 978-7-5516-0207-5

I. ①论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-注释
IV. ①B22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6747 号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: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: 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地 址: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: 250002

电 话: 出版管理部(0531)82098756

市场营销部(0531)82098035(传真)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规 格: 170mm×240mm

印 张: 58.5

字 数: 890 千

定 价: 126.00 元(全三册)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)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庄金兰 杨朝明

委 员：张文科 胡志平 曾振宇 刘振佳 张 斌

总 编：张文科

副总编：胡志平 张 斌

《论语诠解》

主 编：杨朝明

编 委：崔海鹰 魏忠强 郭海燕 王成效 宋立林

魏衍华 郭玉娟 王冉冉 魏 玮 卢 梅

刘淑强 孔 勇 张海涛



《论语》的成书及其文本特征

杨朝明

《论语》作为儒学要典，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材料。然而，这部共二十篇计一万五千余字的著作又非常特殊，这便是该书全部采用了语录体。《论语》成书以来，历代研读该书的人不计其数。尤其是近些年来，无论图书种类还是印刷数量，有关《论语》的出版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可是，我们在对此感到欣慰或者欣喜的同时，也看到《论语》研读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，而这又与《论语》的成书及其文本特征密切相关。那么，《论语》是怎样成书的？其文本又有什么样的特征？在此首先谈谈一些个人的看法。

一、关于《论语》的成书问题

《论语》的材料来自哪里？它是怎样编撰而成的？这是研读《论语》往往首先想到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说法是：

《论语》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，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按照这里的说法，《论语》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孔子的言论，有孔子弟子的言论。孔子的言论中，有他与弟子们的对话，有他与当时其他人的对话；孔子弟子的言论多是弟子之间的相互谈话，而这些也是曾经从孔子那里听来的。这就是说，不论孔子本人的言论，还是孔子弟子的言论，都出于孔子弟子所记。

关于《论语》的成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至少还表述了三层意思：

第一，孔子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论。

《论语》中，不论孔子本人的话还是孔子弟子的话，都应来自孔子弟子的

记录。在孔子长期的教学生涯中,他的弟子常常随时记录老师的言语。

有一次,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“行”的问题,《论语·卫灵公》记曰:

子张问行。子曰:“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,行矣。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,行乎哉?立则见其参于前也,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,夫然后行。”子张书诸绅。

孔子认为,人应当“言忠信,行笃敬”,即说话忠诚守信,行事庄重严肃。人应当时刻牢记,将“忠信”、“笃敬”装在心中,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。只要做到这一点,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顺畅通达。子张觉得老师的话太好了,于是“书诸绅”,也就是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。

孔子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语,在《孔子家语》中有更多的记载。比如,《人官》篇记载:子张向孔子请教为仕之道,即怎样当官治民。孔子就如何达到“安身取誉”作了详尽的回答,所以该篇最后说:“子张既闻孔子斯言,遂退而记之。”子张回去以后把孔子的话记录了下来。又如,《论礼》篇记载:子夏侍坐于孔子,师徒谈到《诗》中所说的“恺悌君子,民之父母”,子夏请教怎么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。于是,孔子进行了一番长谈,他围绕君主修德治国的问题,从怎样为民父母、如何德配天地等方面展开论述。孔子的论述令子夏激动不已,他猛然站起来,表示一定要记录下来。所以,《论礼》最后记载说:“子夏蹶然而起,负墙而立,曰:‘弟子敢不志之?’”

第二,《论语》材料是孔子弟子集撰的结果。

《论语》是“门人相与辑而论纂”的结果,唐人颜师古注说:“辑与集同,纂与撰同。”这样,所谓“辑而论纂”,其实就是“集撰”或者“撰集”。

说到“撰集”,我们不由想到孔安国与《孔子家语》的关系。孔安国本人正是这样表述自己与《孔子家语》之间的关系的,他在《孔子家语后序》中谈到:

元封之时,吾仕京师,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,于是因诸公卿大夫,私以人事慕求其副,悉得之。乃以事类相次,撰集为四十四篇。

在《孔子家语》“后孔安国序”^[1]中,其表述与此大体相同:

[1] 《孔子家语》较早的序文有三个:一为孔安国所作的序,本文称“孔子家语后序”或简称为“孔安国序”;一为王肃所作序;这两者之间,包含孔子世系及孔衍奏言的部分,就是这里所说的“后孔安国序”。该篇序文作者不详,但可知此人应是《家语》的传承之人。根据序文的语气、表述,不难推测他即使不是孔衍的同一辈人,也是距他不远的后辈。

又集录《孔氏家语》为四十四篇。

《孔子家语》“后孔安国序”中引述了孔衍的“奏言”。孔衍表述为：

又撰次《孔子家语》。^[1]

所谓“集录”，就是将已经存在的材料加以聚汇；所谓“撰次”，则不仅仅是汇聚材料而已，而且这种汇聚要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。

汉代的孔子后裔们(包括孔安国本人)所说孔安国与《孔子家语》的关系，对我们认识孔子“门人”与《论语》的关系颇具启示意义。尽管学术界对孔安国与《孔子家语》具体关系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，但这不会影响我们据而讨论“撰集”一词的具体含义。

按照《孔子家语后序》的说法，孔安国以前，《孔子家语》的材料经过了辗转流传，到他那个时期，这些材料“与诸国事及七十子辞妄相错杂”，“与《曲礼》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”。孔安国通过私人关系得到了《孔子家语》，但这些却同样是一堆“乱简”，没有次序可言。于是，孔安国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、比次、编排，即所谓“以事类相次”，也就是“撰集”，从而成为现在的样子。

最初，《论语》的编撰情况恐怕也是如此。在孔子弟子“相与辑而论纂”之前，这些材料应该是已经存在的，其前提便是孔子弟子们的随时记录。

第三，《论语》的编纂在孔子“既卒”之后。

孔子弟子对《论语》的“撰集”，时间是在“夫子既卒”之后。

那么，何谓“既卒”？《尚书·金縢》有“武王既丧”的说法，《史记·鲁世家》作“武王既崩”。无论“既丧”还是“既崩”，都应当表示武王去世以后不太长的时间。^[2]“既”有已、已经之义，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：“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”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”又，《孔子家语·正论解》记孔子曰：“古者天子崩，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。成汤既没，太甲听于伊尹；武王既丧，成王听于周公。其义一也。”此处“既丧”与“既没”并言，应当与《汉书·艺

[1] 按：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·经部》作此。而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孔子家语》后所附该序文则作“又撰《孔子家语》”。清代多以《家语》为伪，将“撰次”省作“撰”，这反映了清人的认识倾向。

[2] 杨朝明：《也说〈金縢〉》，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

文志》所讲的“既卒”一样。《文选·辩命论》注引《傅子》还有一种说法：“昔仲尼既歿，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，谓之《论语》。”“丧”、“没”、“崩”、“卒”、“歿”都是人“去世”的同义语。看来，“既卒”也是古代的通行用法，即表示去世以后不久。

认识到《论语》结撰在孔子“既卒”以后很有必要。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占主流的看法是《论语》“不纯”和“写定很晚”。比如有学者说“《论语》的结集，时间可能晚得多，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，而是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景、武之际”，不承认《论语》有“原始结集”一事，认为不论其结集时间、篇目多少、《论语》传本抑或文字真伪，都还存在问题。^[1]显然，这样的看法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相关记载是不一致的，因为所谓“既卒”虽然表达的是在孔子去世以后，但不可能是孔子去世后那么长的时间。

二、《论语》由子思主持编撰而成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表明：《论语》是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不久后整理编撰既有材料而成。但是，《论语》编撰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，又是怎样编撰的，这些问题《汉书·艺文志》并没有提供更多更明确的说法。因此，后世学者进行研究，并在今本《论语》中寻找内证，也提出了种种看法，而分歧却依然很大。但是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相关记载虽然简单，可还是为研究《论语》的成书问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论语》类文献共有“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”，在作者看来，这些都应与今本《论语》具有同样的性质。比如，《孔子三朝》七篇，颜师古注曰：“今《大戴礼》有其一篇，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。三朝见公，故曰三朝。”这也属于孔子应答时人而为当时弟子所记的内容。

最值得认真思考的是《孔子家语》也被列入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“《论语》类”文献。《孔子家语》与《论语》两书之间的关系，对于说明《论语》的成书很有价值。这里著录的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，与今之十卷本《孔子家语》有别。学者们知道，古代图书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，卷帙的分合是十分正常的现象，这里的二十七卷本与王肃注的十卷本或有不同，但二者的主要内容应该一致。颜师古说这个二十七卷本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，这可能是收藏在西汉秘

[1] 朱维铮：《〈论语〉结集胜说》，《孔子研究》1986年创刊号。

府中的本子,不过此本不如经孔安国整理、后由王肃作注的本子更为细致。

孔安国在《孔子家语后序》中谈到《孔子家语》与《论语》的关系,他说:

《孔子家语》者,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,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,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时。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,别出为《论语》,其余则都集录之,名之曰《孔子家语》。

长期以来,人们以《孔子家语》为伪书,孔安国序也被认为是伪作,因此,孔安国所说的这些话向来不被人们所注意。而今,《孔子家语》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,孔安国的叙述也应当给予应有的重视了。

《孔子家语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“并时”,三者时代上一致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《孝经》者,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。夫孝,天之经,地之义,民之行也。举大者言,故曰《孝经》。”看来,无论是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还是《孔子家语》,其材料都来自孔子弟子。所以孔安国又谈到《家语》的特征说:

凡所论辩,疏判较归,实自夫子本旨也。属文下辞,往往颇有浮说,烦而不要者,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,加之润色,其材或有优劣,故使之然也。

弟子们从孔子那里得来“第一手材料”,然后“叙述首尾”,进行适当加工。由于材料出于众手,故“其材或有优劣”。与《论语》、《孔子家语》不同的是,《孝经》是“孔子为曾子陈孝道”的专篇,如果这些材料都出于孔子弟子,是孔子弟子“接闻于夫子之语”,那么《孝经》应当出于曾子,而《论语》和《孔子家语》则应当出于众手。与《孔子家语》不同,《论语》则经过了材料的认真拣选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的“论纂”或即此意。

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值得注意,即认为“论语”的“论”有“选择”、“别择”之意。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屯部》曰:“论,假借为抡。”《国语·齐语》曰:“权节其用,论比协材。”韦昭注:“论,择也。”《荀子·王霸》曰:“君者,论一相,陈一法,明一指,以兼覆之,兼照之,以观其盛者也。”杨倞注:“论,选择也。”

关于“语”的意思,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语,论也。”《广雅》说:“语,言也。”是则“孔子家语”应该就是“孔子家”的论说集或言论集,也就是在“孔子家”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、言论集。如果《论语》书名的“论”为“选择”之意,那么《论语》应该是选自“孔子家”之“语”中的材料。当然,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今本《论语》就一定出自《孔子家语》其书。这样理解《论语》书名的含义,与孔安国所

说完全一致。或者说,这种看法更接近《论语》成书的历史事实。

那么,现在的问题就是《论语》最初成书于何人之手了。

从新发现的材料看,《论语》中孔子称谓的差异,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,并不能作为《论语》成书较晚的证据。今本《论语》后十篇中称“孔子”的地方,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本有的称“子”。如《阳货》篇:“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:‘能行五者于天下,为仁矣。’”《尧曰》篇:“子张问于孔子曰:‘何如斯可以从政矣?’子曰:‘尊五美,屏四恶,斯可以从政矣。’”在简本中,以上两章中的“孔子”均称“子”。另外,今本《论语》称“子”的地方,竹简中有的则称为“孔子”,说明《论语》中的称谓在抄写过程中会有一定变化。因此,《论语》的成书时间不能完全以此来判断。

《论语》中记载有曾子临终之言,该书成书时间的上限在曾子去世之后当然没有什么问题,问题在于《论语》成书时间的下限。而郭店楚简的发现,使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《论语》结集时间的下限。

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的成果证明,其中的儒家著作属于久已佚失的《子思子》,同时也证明《隋书·音乐志》引沈约所云“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缙衣》,皆取《子思子》”是有根据的。《礼记·坊记》中已经出现了“论语”之名,《坊记》曰:

子云:“君子弛其亲之过,而敬其美。”《论语》曰: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”高宗云:“三年其惟不言,言乃欢。”

《坊记》为《礼记》中的一篇,而《礼记》乃是汇聚原有典籍而成,《坊记》也当为戴圣取自子思之书。西汉时期,孔子后裔孔衍曾经上奏朝廷,希望重视《孔子家语》。孔衍的奏言中说:“戴圣皆近世小儒,以《曲礼》不足,而乃取《孔子家语》杂乱者,及子思、孟轲、荀卿之书以裨益之,总名曰《礼记》。今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,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,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。”孔衍所说,其言不虚。

如果《坊记》引用的《论语》之言还有可能是《礼记》编者所添加,那么,郭店楚简的引述则应当可以旁证乃至坐实《论语》的早出。郭店楚简的《语丛》中也引述了《论语》中的句子:《语丛三》第五〇、五一简,据研究,可以隶定为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,这段话,明显与《论语·述而》一致。《语丛三》第六四、六五简,两简有中线作为界隔,第六四简编线以上有“亡(毋)意

亡(毋)古(固)”四字,编线下有“亡(毋)物不物”四字;第六五简中线以上是:“亡(毋)义(我)亡(毋)必”,编线下有“皆至焉”三字。栏线上面的应当接着读,下面实际是对上面的解说。这样,二简应当是“毋意、毋固、毋我、毋必”。《论语·子罕》曰:“子绝四: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”顺序虽有差别,但二者至少应当同源。

看来,战国时的楚国不仅有《子思子》流传,也有《论语》流传。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不少语句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孔子言语相近,情况大致都是如此。出土郭店楚简的古墓,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,墓葬中的书籍成书时间应在其前。这就意味着公元前300年以前,《论语》已经在南方的楚国流传,也证明子思在其著作中引述《论语》很有可能。

《坊记》中明引《论语》,而且《坊记》与郭店楚简的许多篇章明显属于《子思子》,则子思生活的时代《论语》应当已经成书。由于材料有限,子思生卒年不十分清楚。钱穆先生研究子思在世时间约为公元前483年~前402年,今有学者研究子思在世时间约为公元前491年~前400年,^[1]是则《论语》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400年以前。《论语》中记有曾子临终之语,则《论语》的成书时间上限应当在曾子去世的公元前428年,所以,《论语》成书的具体时间可以限定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二十几年之中。

关于《论语》的编纂者,有人认为是孔子众弟子,有人认为是仲弓、子游、子夏,有人认为是子思,有人认为是曾子弟子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有学者提出《论语》为曾子领纂^[2],笔者认为这个说法近于实际。我们进而还认为,《论语》由子思主持完成应当更为合理。^[3]

子思为曾子弟子,在曾子去世后地位特殊,有儒学领袖风范。说《论语》出于子思,不仅与以前学界的论证相合之处较多,更重要的是符合《论语》内容所反映出来的信息,与孔子之后儒学传承的实际十分吻合。

《论语》的材料来自众弟子所记,其中除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称谓以外,对于诸事的不同的记录方式、语气也透露了其汇编聚集的痕迹。

[1] 钱穆:《先秦诸子系年·子思生卒考》,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;孔德立:《〈孔丛子〉与子思生年问题》,《齐鲁学刊》2004年第2期。

[2] 贾庆超:《曾子领纂〈论语〉说》,《东岳论丛》2003年第1期。

[3] 杨朝明:《新出竹书与〈论语〉成书问题再认识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2003年第3期。

《论语》为孔门弟子所记，刘向认为是孔子弟子“辑而论纂”，王充《论衡·正说篇》说为“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”，应该都是可信的。《论语》不仅以“子曰”的形式叙述孔子言语，而且记有许多孔子与弟子的问答，其中涉及弟子有名姓者就有三十人，这些材料当不会出于一人或者少数几人，其内容应该多是由众多弟子记录而成。

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：一方面，《论语》出于曾子门人，阅读《论语》，其中厚重的曾子言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除了曾子门人，他人一般不会如此编辑；另一方面，论者又指出，《论语》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，而孔门的严重分化又难以聚集这么多的材料。要解决这样的矛盾，合理的推论只能是众弟子将材料汇聚到一起，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、选辑、编订，而这位整理编订者应在孔门之中地位尊隆，而且应是曾子门人。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。

我们认为，研究《论语》的成书应当与《孔子家语》联系起来考虑。孔安国的《孔子家语后序》说《孔子家语》和《论语》都出于“诸弟子各记其所问”，说《孔子家语》与《论语》“并时”。尔后，“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，别出为《论语》，其余则都集录之，名之曰《孔子家语》”。所以，如果说《论语》有“语录”性质，那么《孔子家语》则与“文集”相近。《孔子家语》是弟子记录的汇编，其中虽然有后来增加、整理的成分，但基本还是原始面貌的保留。

有人推测，《论语》的结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后不久，因为“以常情而论，孔子歿，‘微言’绝，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，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，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，‘微言’分散，不利于传夫子之道吗？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《论语》，时机最为成熟，汇集资料最为方便。”^[1]此说很有道理。《孔子家语》中有《终记解》一篇，记录孔子临终前的一些情形，似乎可以说明这样的推测有道理。只是此时所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，它应该就是《孔子家语》的雏形。而从孔子言语中“取”（或“选择”）出“正实而切事”的《论语》，应该是这之后的事情。

《孔子家语》之所以被称为“家”，因为其中记录了孔子的身世、生平，又有《本姓解》叙述其家世源流，说明《孔子家语》属于“孔氏家学”的范畴。而

[1] 黄立振：《〈论语〉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》，《孔子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《孔子家语》与《论语》“并时”的情况表明,二者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。

三、《论语》的文本特征

显而易见,《论语》不同于其他许多著作之处在于它是“语录体”。也是因为如此,《论语》具有了孔安国所说的“正实而切事”的突出特征。

在《孔子家语后序》中,孔安国谈到孔子后学编撰《论语》时,其选取材料的标准是“正实而切事”。所谓“正实”,不仅说明了《论语》材料与孔子的关系,而且与子思作为《论语》的编订者有关。

如何理解孔子遗说材料的来源,2002年出版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二)》中的《从政》篇对此颇具启发意义。《从政》篇现存竹简中,仅仅“闻之曰”就出现了至少十三次,经认真比较研究,《从政》篇中的“闻之曰”与“子曰”相同,说的正是“闻于孔子之言”。以“闻之曰”起始的每一节都集中论说一个主题,彼此相对独立。如前所述,《礼记》中有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缙衣》,据《隋书·音乐志》,沈约曾说这四篇属于《子思子》。将《从政》篇的这些竹简与现存于《礼记》中的《子思子》四篇进行对照,不难发现其结构非常一致。《孔丛子·公仪》记穆公对子思所说“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”,表明《子思子》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孔子的话的。《从政》篇与郭店楚简、《礼记》四篇等子思著作又在内容上有密切关联,所以,我们认定《从政》篇应该属于《子思子》的佚篇。^[1]

发现《从政》篇属于《子思子》有重要的意义:一则说明《子思子》书中有多篇都是以“子曰”或“闻之曰”的形式大量排比孔子言论,二则说明了其中子思所记述的孔子语录的性质和可靠性问题。《孔丛子·公仪》记曰:

穆公谓子思曰:“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,或者以谓子之辞也。”子思曰:“臣所记臣祖之言,或亲闻之者,有闻之于人者,虽非其正辞,然犹不失其意焉。且君之所疑者何?”公曰:“于事无非。”子思曰:“无非,所以得臣祖之意也,就如君言,以为臣之辞。臣之辞无非,则亦所宜贵矣。事既不然,又何疑焉?”

子思之言交代了《子思子》所记孔子遗说的特征,即子思所谓“或亲闻之者,有闻之于人者,虽非其正辞,然犹不失其意”。由此可知,《子思子》中大量的

[1] 杨朝明:《上博竹书〈从政〉篇与〈子思子〉》,《孔子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

孔子言论,有不少应该就是“闻之于人者”,虽然“不失”夫子之“意”,但可能“非其正辞”。相比而言,《论语》所记则应当属于孔子之“正辞”,也就是孔安国所说的“正实”。

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的话自不必说,显然都是孔子弟子等人记录整理的结果,即使“弟子相与言”之语,也能够透露出他们在表达孔子的思想。例如《颜渊》篇记曰:

司马牛忧曰:“人皆有兄弟,我独亡。”子夏曰:“商闻之矣: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,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,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?”

在这里,子夏所闻,或者即是来自孔子。而按照《论衡》以及朱熹《四书集注》的说法,这里的“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”,应当就是子夏闻于孔子之言。

如果《颜渊》篇的记述还不能确定子夏所闻就一定来自孔子,那么,《季氏》所记孔子弟子陈亢与伯鱼的对话则透露了孔子弟子主要是通过“闻”的方式了解孔子的教诲。显然,这些教诲被弟子记录整理下来,就见于现在的《论语》等典籍中。《季氏》记载说:

陈亢问于伯鱼曰:“子亦有异闻乎?”对曰:“未也。尝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‘学《诗》乎?’对曰: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又独立,鲤趋而过庭。曰:‘学《礼》乎?’对曰: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礼》,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《礼》。闻斯二者。”陈亢退而喜曰:“问一得三。闻《诗》,闻《礼》,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。”

《子张》篇中的记述更具有典型意义:

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:“子夏云何?”对曰:“子夏曰:‘可者与之,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张曰:“异乎吾所闻:君子尊贤而容众,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,于人何所不容?我之不贤与,人将拒我,如之何其拒人也?”

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,子夏门人向子张求教问题。子夏所言与子张不同,最后子张还是以自己从孔子那里听到的相告,《论语》这里所表述的还是孔子的思想。《子张》篇中又记述说:

曾子曰:“吾闻诸夫子:人未有自致者也,必也亲丧乎!”

曾子曰:“吾闻诸夫子:孟庄子之孝也,其他可能也。其不改父之臣,

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

曾子的这两段话，都是直接转述的孔子言论。

实际上，在与弟子相处的日子里，孔子往往与不同的弟子讲述不同的内容，所以，《公冶长》篇记载说：“子贡曰：‘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’”子贡“不可得而闻”的内容，其他弟子未必也是如此。孔子弟子亲闻于夫子，其“正实”可靠不言而喻。

除了“正实”，《论语》还具有“切事”的特点。所谓“切事”，子贡所言恰恰也有透露。关于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”，人们的理解不同：一则理解为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，所以子贡不能听到；二则理解为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高深微妙，连子贡自己也难于知解。但不论是哪种理解，都说明与“性与天道”相比，孔子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。这是《论语》作为“语录体”的选材标准问题，而不是孔子是否谈论性与天道的具体问题。

与《孔子家语》相比，《论语》的“切事”特点更加明显。有人认为《孔子家语》是王肃伪作，朱熹就不同意这一说法。据《朱子语录》记载，他认为《孔子家语》“非王肃所作”，但其书“多疵”；又说《孔子家语》“是当时书”，但“记得不纯”。所谓“不纯”，无非是因为《孔子家语》乃是将孔子遗说的材料“都集录之”，而不是像《论语》那样进行了拣选。

《论语》“切事”的特点也应该与子思的纂辑有关。子思既然是总体上来编撰孔子语录，而且是要在众多的材料中选择孔子遗言，那么，他就一定会考虑哪些孔子言论更具有直接教化社会人心的作用，哪些更符合孔子的最终关切点。显然，《论语》有特定的选材标准，正因如此，《论语》不会记录孔子的所有言语，更不会记录孔子的所有事迹。

四、怎样全面准确理解孔子学说

由材料来源、结集成书的种种特征所决定，《论语》毫无疑问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。但是，如果认为只有《论语》才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如果那样认为，孔子儒学研究就会丧失很多珍贵的文献材料。

孔子长期从事教育，他的弟子们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孔子遗说，它们多以“子曰”、“孔子云”之类的形式保留下来。对于“孔子遗说”，历来研究者众多，分歧却也极大。长期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，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，中国古

代文化典籍是被怀疑的重点。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,很多古籍被打入“伪书”行列,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。中国思想史学科“受灾”最为严重,不少珍贵材料被“武断地加以剔除”。

有学者说,经过疑古学者的剥离,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“似乎只有《论语》一书了”。其实,《论语》本身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。长期以来,流行的看法是《论语》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,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尤其是清朝以来,疑古高潮迭起,《论语》也像几乎所有的典籍一样受到怀疑。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《论语》的流传着眼,人们认为,《论语》等书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,就必然会造成“不纯”。

崔述的观点最具代表性,他论定《论语》一书有“窜乱”,有“续附”,《论语》编订初始,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,而是“各不相谋”,其后才汇为一本,又有“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”。崔述的根据主要是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上有所不同,认为尤以最后五篇为不足信。

对崔述的观点,顾颉刚先生叹服不已,倍加赞赏。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对《论语》一书的主流看法。崔述的观点还影响到国外,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。如美国学者顾立雅(H.G.Creel)、日本学者木村英一也是如此,后者研究《论语》各篇,一一落实其写成的时间,甚至“考证出”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、三传、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,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。某些西方学者对《论语》的怀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据说,20世纪30年代,受疑古思潮的影响,英国的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,《论语》一书二十篇,只有第三至第九篇是可靠的,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。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,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。有一对学者夫妇——布鲁克斯夫妇(白牧之、白妙子),他们只相信第四篇的前二十章是可靠的,其余都是孔子的学生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。这一观点引起了较大的争议,新闻媒体对这一观点作了各种发挥与引申。由于认识与方法的严重偏差乃至错误,本来思想体系博大的“孔夫子”变成了“空夫子”。

近三十年来出土了大批的学术文献,尤其是阜阳汉简、定州汉简、马王堆汉墓帛书、郭店战国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等,不仅可以补充孔子和早期儒学研究的资料,而且可以纠正以前研究中的偏失。显然,“孔子遗说”研究应当主要结合新出土文献,分别对有关的孔子材料进行文

献学、思想史的深入考察,进而在认真对待传统记载、深刻反思既往研究、全面分析新的学术信息基础上,对孔子遗说的形成、特征以及我们应持的态度,作出客观的、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估价。

我认为,对孔子遗说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:第一,将研究放在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。以前,人们对我国古代尤其是三代文明发展的水平估价不足,而大量的出土材料已经使原来不少朦胧、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、生动起来,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条件。第二,将孔子回归到他所处的时空中去研究。按照“知人论世”原则,让孔子真正回归到春秋末年的鲁国,回归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,结合西周以来鲁国的礼乐传统,结合春秋时期鲁国的文化品格,来探索孔子的心灵世界。第三,既要克服疑古思潮造成的巨大束缚,也不要盲目信古,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,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认真比较,综合分析,从而补偏救弊,不受既有观念束缚,检核既往成果,做到言之有据,无征不信。

依照我们的看法,关于孔子遗说的许多问题,早期记载本来比较清晰,但由于后人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不当,有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,古书序列混乱;有的被定为伪书而弃之不用;还有的连学派属性也被误指(如《易传》)。孔子与六经、孔子遗说的研究,是整个所谓“原典”文化研究的基础。孔子“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”,熟悉古代典籍。在他看来,六经各有特点,但都有益于社会政治。孔子非常重视六经的“王道”教化功能,从而整理了六经,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。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,孔子的大量说教被弟子后学记录下来,后来,这些记录流传广泛,受到普遍重视。曾子和作为孔子之孙的子思曾经辑集孔子遗说,《论语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保留在《礼记》中的有关篇章、郭店儒简、上博竹书《从政》,还有保存在《孔丛子》中的四篇孔子遗说,可能都出于他们的整理。只有了解这一点,才能更好地理解《论语》,才能准确而全面地了解孔子学说。

五、关于《论语》全书的结构

研读《论语》,自然是为了理解孔子,学习孔子学说。然而,作为孔子的“语录”,《论语》中的片言只语往往具有很多歧解,实际情况往往是:人们研究《论语》与孔子,常常将其中的一句话进行分析解读,而没有注意从全书的结构出发,没有综合其他相关记载,于是便人云亦云、莫衷一是,甚至与本义